读史札记

清代中正榜考略

杨 立

乾隆朝中后期，曾在会试落卷中选出楷法端正、文理通顺及诗律稳妥者若干名，另设一榜，此榜人员专为选补内阁汉中书和国子监学正、学录而开，取“中书”和“学正”各一字，是为中正榜。乾隆二十六年（1761）辛巳科、三十四年己丑科、三十七年壬辰科三次会试设中正榜，乾隆五十五年停止。中正榜只在乾隆朝开设过三次，选取的人数也不多，是以在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中不受关注。① 本文旨在清代科举及文官铨选的背景中研究中正榜，一方面，探析会试后中正榜的选取范围、标准、办法及程序等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梳理中正榜人员的仕途履历，分析影响他们仕途发展的出身、能力和际遇等相关因素。此外，对易发生混淆的中正榜和明通榜进行辨析。

一、中正榜的设立和规制

（一）中正榜的选取

中正榜设立之前，内阁汉中书和国子监学正、学录由进士、举人考试补用。内阁中书掌“撰拟、记载、翻译、缮书之事”，② 秩从七品，设有满、蒙古、汉军和汉缺，内阁汉中书额设 30 人。国子监学正、学录，“学正汉八人，学录汉二人，分隶六堂，以掌教课”，③ 秩正八品。此三职虽属于品级不高的小京官，但用人重出身，倾向科甲正途。雍正二年（1724）定内阁汉中书缺，“不分进士、举人，由内阁考取引见，照取中名次，遇员缺移送过部，具题选用”，④ 国子监学正、学录在雍正八年定“令九卿于进士、举人内保举咨部，引见补授”，⑤ 乾隆十九年改为“国

[收稿日期] 2019-09-17
[作者简介] 杨立（1975—），男，铜陵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铜陵 244061；tlyangli1975@163.com

① 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年）从科举考试角度提及中正榜；王德昭的《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 年），李世愉、胡平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和马镛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则从举人会试落第政策方面介绍了中正榜。以上著作只是简略介绍，并未深入展开，对中正榜选取规定的变化，以及中正榜人员的仕进情况等方面均无涉及。目前尚无专门研究清代中正榜的论文。

② 《清朝通志》卷 64《职官略一·内阁》，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7140 页。

③ 《清朝通志》卷 67《职官略四·国子监》，第 7154 页。

④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57《吏部·汉员遴选》，《续修四库全书》第 79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7 页。按：清初一度允许贡、监生考补内阁汉中书，康熙三十四年定为进士、举人选授。

⑤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58《吏部·汉员遴选》，第 50 页。

子监学正、学录，嗣后照考试内阁中书之例，由部请旨，将进士、举人一例考试，特简大臣校阅，其取录人员，由部带领引见，记名简补”。① 内阁中书“有撰文缮写之责，文理固宜明通，字画尤须端楷”，② 国子监学正、学录“有教士之责，按其文理优通，酌量拟取”，③ 职司所需，选人向来对文字水平要求较高，尤其是选取内阁中书很看重书法水平。

乾隆二十六年二月，东阁大学士蒋溥奏陈：

> 内阁汉中书向例由进士、举人考取录用，试卷糊名，并不易书。士子因有笔迹可认，易滋物议。现届会试之期，请即于各房荐卷中，除中式外，择其文理尚通，诗律亦妥者，不拘省分，查照上次考定名数，另填一榜，照例带领引见。挨次选用。嗣后凡值需人之时，令内阁先期咨部，照例办理。④

本衙门考试或钦简大臣考取，存在作弊的可能性，相比较而言，会试作为抡才大典，防控较严，且天下举子齐聚京师，可选择范围也更广。此奏经由礼部议覆，得到乾隆帝的首肯：

> 于会试荐卷中挑取，事属可行。但考官所校，仅在文义，似未可以场中所取之数，概行授官，应请不拘省分，以四十名为额，再备取二十名，随同新进士引见，恭候钦定。再中书若专用举人，遇会试之年，恐俱愿入闱应试，办事必至乏人，应于新进士引见时，请酌用数员，与举人中书，一体补用。从之。⑤

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国子监学正、学录也照此法开始选补：

> 礼部议覆，御史范棫士奏称国子监学正、学录向由考取记名，今内阁中书既议于会试荐卷中挑取，应请一例办理。于取录中书额数，量为宽取数名，不必豫定款项，统俟引见录用等语。查取录中书名数，议准六十名，其年力老成，宜于课士者，请于引见时，量用数员，交部以学正、学录选用，无庸另定取额。嗣后国子监需人，先期咨部办理。从之。⑥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会试后，首设中正榜，“乾隆十九年，国子监学正、学录始用进士、举人考选录用，停止九卿保举之例。二十六年，定于会试取中余卷内选取，与内阁中书一例，所谓‘中正榜’始此”。⑦ 中正榜最初是从会试荐卷之落卷中选取，⑧ 并准备酌用部分新进士，但辛巳科选取出的汤上选、姚士烺等 43 人都是举人。⑨ 另外，内阁中书向来重字，仅阅誊录之朱卷无法识其书法水平，于是，乾隆三十三年六月，调整了选取办法：

> 吏部议覆：御史蒋曰纶奏称，内阁中书请于每科新进士内添用。查中书一官，向为举人、进士两项进身之路，而其职掌，则专以字画工楷为重。请将朝考入选未用人员试卷，另行封固，以备选择。其举人一项，向来专就朱卷酌取，无凭校核字画。请嗣后于荐卷内，酌取举人朱墨各卷，同朝考入选未用进士试卷一并奏派大臣，汇总校阅，录其文字俱优者，带领引见。从之。⑩

此后，朝考未入庶常馆之新进士参与选取中正榜。对入选人员，既阅看其朱卷，还要抽查墨卷，⑪ 这样才能选得文与字俱优者。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会试后，中正榜选取了“任基振、姚

---

①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58《吏部·汉员遴选》，第 51 页。

②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57《吏部·汉员遴选》，第 47 页。

③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58《吏部·汉员遴选》，第 51 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 630，乾隆二十六年二月甲申。

⑤《清高宗实录》卷 630，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壬寅。

⑥《清高宗实录》卷 630，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壬子。

⑦ 赵慎畛：《榆巢杂识》，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22 页。

⑧ 清代乡、会试，同考官阅卷，若有合适之卷则印上荐卷条记，呈荐主考官，由主考官权衡取中。同考官未荐之卷和呈荐而未被主考官取中之卷，统称“落卷”，但有区别。见《钦定科场条例》第 1 册卷 17,《故宫珍本丛刊》第 336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210 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 3 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1 年，第 644 页。

⑩《清高宗实录》卷 813，乾隆三十三年六月丙寅。

⑪ 清代乡、会试中，荐卷（朱卷）取中后，再拆去墨卷糊名填榜。未中式之举人当然是不用拆看其墨卷的。

梁”等 48 人，[1] 其中 8 人为是科进士。

乾隆三十六年，清廷再次调整中正榜的选取规定：

> 举人中书一项，向于朝考馆选后，奏派大臣在荐卷内录用，嗣后改为发榜日，主考等官出场，知贡举将荐卷弥封，即行奏派大臣阅取，惟各房荐卷原以朱卷为凭，字画之工拙本不能知，多有落卷内字画堪以录用，因一二文艺小疵未经呈荐者，今仅将荐卷一项挑取，殊觉未尽。嗣后，各省举人墨卷，应不分曾否呈荐，俱交知贡举弥封省份红号，一并交阅卷大臣选取。即令主考官于出场次日，仍行入闱，将各墨卷校阅，按数选取，其所取卷数，编定次序，先行具奏，即行揭示，缮写名单，移交礼部，转行内阁、翰林院，俟进士朝考毕，一同带领引见，恭候钦定，交部录用。[2]

发榜当天即行选取，这是出于防范作弊的考虑，其选取范围由会试荐卷扩大到会试全部试卷，且专阅墨卷，以字画工拙为主要选取标准。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会试后，又定“此次应取中书、学正、学录等卷，着照议，交主考官阅取，所有同考官均无庸在闱分校”,[3] 即由主考官选取中正榜。壬辰中正榜共取李棨、吕云从等 40 人，[4] 其中新科进士 8 人。

刊刻于乾隆四十八年的《钦定吏部则例》对中正榜的选取基本定型：

> 内阁汉中书员缺，进士、举人相间轮用。吏部将应用中书人数多寡届期知会内阁、翰林院，进士于馆选后将朝考录取未经简用之新进士引见记名，举人于会试墨卷内，不分曾否呈荐，仍令主考、同考校阅，按数酌量选取，编定次序，奏闻揭示，缮写清单，移交礼部，转行内阁、翰林院，随同新进士引见，恭候钦定，交于吏部，遇缺仍由内阁挨名移送吏部带领引见补授，试俸一年，听内阁考核称职，移送吏部具题，准其实授。
>
> 国子监学正、学录由国子监先期咨明礼部，于会试墨卷内不分曾否呈荐，仍令主考、同考各官校阅，录取十余名，随同新进士引见记名，交吏部每遇一缺，按名次先后传齐三人带领引见补授。[5]

（二）中正榜的效用

中正榜的选取规制经过不断的修订和调整，较为严密，从选取范围、标准、办法、程序和人数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见表 1）。中正榜简化了内阁汉中书和国子监学正、学录的选用程序，通过会试直接选补人员，不必再进行专门的考试，提高了铨选效率。先阅朱卷再查墨卷，文字并重，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部门考试因识别字迹而出现作弊等情由。

表 1　中正榜的选取

<table>
<tr><th colspan="2">中正榜</th><th>选取范围</th><th>选取标准</th><th>选取办法</th><th>选用程序</th><th>选取人数</th></tr>
<tr><td rowspan="2">辛巳</td><td>内阁中书</td><td rowspan="2">会试荐卷未中式之卷</td><td>文理尚通、诗律稳妥</td><td rowspan="2">会试考官以朱卷文义选取</td><td rowspan="6">内阁、国子监先期咨（吏）部，礼部与新进士一同带领带领引见，恭候钦定，交（吏）部选用</td><td rowspan="2">43 人（未指明学正、学录人数）</td></tr>
<tr><td>学正、学录</td><td>年力老成，宜于课士</td></tr>
<tr><td rowspan="2">己丑</td><td>内阁中书</td><td rowspan="2">同上，增加朝考入选未用之进士</td><td>字画工楷
文字俱优</td><td rowspan="2">酌取荐卷举人朱墨卷和朝考未用进士之卷，奏派大臣，汇总校阅</td><td>40 人</td></tr>
<tr><td>学正、学录</td><td>同上</td><td>8 人</td></tr>
<tr><td rowspan="2">壬辰</td><td>内阁中书</td><td rowspan="2">所有会试试卷</td><td>同上</td><td rowspan="2">会试主考官于放正榜后，再入闱选取，编定次序，先行具奏，即行揭示，缮写名单</td><td>30 人</td></tr>
<tr><td>学正、学录</td><td>同上</td><td>10 人</td></tr>
</table>

① 《乾隆朝上谕档》第 5 册，第 784 页。

②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353《礼部 · 贡举》，第 540 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 904，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丁酉。

④ 《乾隆朝上谕档》第 7 册，第 68 页。

⑤ 乾隆《钦定吏部则例》卷 5《铨选汉官 · 拣选》,《故宫珍本丛刊》第 282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223−224 页。

中正榜不断扩大选取范围，这也是对选才和选官的一种慎重态度。科考中的考官阅卷和荐卷，人为因素明显，考官水平参差，并非都能秉公客观，以致于取中之人并非合式，如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会试后磨勘，出现这样的情况：

> 陆宗楷等覆勘会试中式朱墨卷进呈，内中式第二十名梁泉一卷，经磨勘官王显曾签出疵谬之处，多至四十余签，请旨罚停殿试二科等语。今阅梁泉卷，疵谬之处，层见迭出，而文亦不佳，本不应中。此而滥中，则佳文致遗落者反多。①

其实，此类事件在清代科考中并不少见，为了防止佳卷被弃用，从落卷中选取中正榜人员，予以出路，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埋没人才。

清代科考虽管控严密，但仍有难以防范之处，科场屡发诸如换卷、窜改试卷，甚至污损试卷等作弊之案。试举一例，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山西道御史戈涛奏，访得本科顺天乡试有割卷及誊录改文之弊，乞敕闱中主司监临将各卷查封”。② 中正榜选取要校阅朱、墨卷，正可对收卷、弥封、誊录、填号、对读等科场各个环节起到监督作用。

中正榜的选取也有疏通落第举人仕途的作用。清室定鼎中原，开科取士，科甲出身为入仕正途之主流，至乾隆朝，经过多年累积，人数越来越多，再加上捐纳和保举等影响，连进士得缺也要等数年，遑论举人。“每科中额一千二百九十名，统十年而计，加以恩科，则多至五千余人。而十年所铨选者，不及五百人，除各科会试中式外，其曾经拣选、候选者尚余数千，经久愈多，遂成壅积”。③ 众多举人终年困顿场屋，无所出路，以致“举人选班壅积日久，现今犹需次至二十年，方可得缺。以致中年登科者，至精力就衰之时方膺民社，难收实用”。④ 中正榜平均每次取四十余人，而清代会试中式进士平均每科不过二百名左右。三次中正榜人员共取 131 人，其中举人 115 人，它多少为乾隆朝落第举人提供了入仕的另一条渠道。

二、中正榜人员的出路与仕进

中正榜人员中既有举人，也有进士，他们入仕后的出路及官职迁转可以看作是清代科甲人员仕途的一个缩影。从中正榜人员的履历来看，他们无论任职京、外，仕途都呈金字塔形，即除了极少数人能官至卿贰以上，或位列督、抚外，大多数止于中、下级文官。京官中，壬辰中正榜的章煦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宋镕任刑部左侍郎；己丑中正榜的邵自昌官至左都御史，金光悌为刑部尚书。辛巳中正榜的阮葵生官至刑部右侍郎。官至京堂者 6 人：辛巳榜的李廷钦为光禄寺卿，梁景阳为太仆寺卿；己丑榜的范鏊为光禄寺卿，王友亮为通政使司通政副使；壬辰榜的李棨为奉天府丞，汪镛为顺天府丞。另有翰、詹 7 人，科、道 9 人，更多的则为部院之司员 12 人和小京官 30 人。外官当中，壬辰榜的吴熊光官至两广总督，汪日章为江苏巡抚；己丑榜的孙永清官至广西巡抚。官至藩、臬的有：辛巳榜的王家宾任广西按察使；己丑榜的许祖京为广东布政使、姚梁为广西按察使；壬辰榜的吴俊为山东布政使，王庆长为福建按察使。辛巳榜的章棠任山东盐运使。还有道员 8 人、知府 10 人、府同知和通判 10 人、州县 3 人（见表 2）。⑤ 同为中正榜人员，随着他们

---

① 《清高宗实录》卷 832，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丁卯。

② 《清高宗实录》卷 670，乾隆三十七年九月丙寅。

③ 《乾隆朝上谕档》第 4 册，第 726 页。

④ 《乾隆朝上谕档》第 1 册，第 54 页。

⑤ 统计说明：（1）军机章京资料取自《枢垣记略·汉军机章京题名》（梁章钜、朱智撰，中华书局，1984 年）。（2）进士资料取自《清朝进士题名录》（江庆柏编著，中华书局，2007 年）。（3）馆选庶吉士资料取自《词林辑略》（朱汝珍编著，见《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 18》）。（4）国子监学正、学录资料取自《钦定国子监志·官师录》（文庆、李宗昉等纂修，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年）。（5）其他资料：《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秦国经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引得编纂处编，中华书局，1960 年）、《清代传记丛刊》（周骏富辑，明文书局，1985 年）、《清代职官年表》（钱实甫编，中华书局，1980 年）等。共得 110 人履历，还有 21 人履历待考。

出身的变化、入仕官职的不同，以及个人能力和际遇差别，仕途也会发生较大差异。

表 2　中正榜人员的任用与迁转

<table>
<tr><th colspan="2">人员</th><th>出身</th><th>充军机章京</th><th>复中进士</th><th>迁转情况</th></tr>
<tr><td>辛巳中正榜</td><td>内阁中书
学正、学录
（43 人）</td><td>举人</td><td>3 人</td><td>乾隆 28 年 8 人
乾隆 31 年 1 人
乾隆 34 年 3 人
乾隆 37 年 1 人
馆选庶吉士 6 人</td><td>部堂 1 人；京堂 2 人；翰詹 1 人；司员 3 人；小京官 9 人
按察使 1 人；盐运使 1 人；道员 4 人；知府 3 人；同知 2 人；州县 3 人
13 人履历待考</td></tr>
<tr><td rowspan="3">己丑中正榜</td><td rowspan="2">内阁中书（40 人）</td><td>进士（8 人）</td><td>2 人</td><td></td><td rowspan="2">部堂 2 人；京堂 2 人；翰詹 2 人；科道 5 人；司员 6 人；小京官 4 人
巡抚 1 人；布政使 1 人；按察使 1 人；道员 4 人；知府 3 人；同知、通判 5 人
4 人履历待考</td></tr>
<tr><td>举人（32 人）</td><td>13 人</td><td>乾隆 36 年 2 人
乾隆 40 年 3 人
乾隆 43 年 3 人
乾隆 45 年 2 人
乾隆 46 年 1 人
乾隆 54 年 1 人
馆选庶吉士 8 人</td></tr>
<tr><td>学正、学录（8 人）</td><td>举人（8 人）</td><td></td><td>乾隆 36 年 1 人
乾隆 37 年 1 人
乾隆 40 年 2 人
馆选庶吉士 2 人</td><td>翰詹 1 人；科道 1 人；小京官 3 人
知府 2 人；通判 1 人</td></tr>
<tr><td rowspan="3">壬辰中正榜</td><td rowspan="2">内阁中书（30 人）</td><td>进士（8 人）</td><td>4 人</td><td></td><td rowspan="2">大学士 1 人；部堂 1 人；京堂 2 人；翰詹 3 人；科道 3 人；司员 2 人；小京官 7 人
总督 1 人；巡抚 1 人；学政 1 人；布政使 1 人；按察使 1 人；知府 1 人；同知 1 人
4 人履历待考</td></tr>
<tr><td>举人（22 人）</td><td>9 人</td><td>乾隆 40 年 6 人
乾隆 43 年 2 人
乾隆 45 年 1 人
馆选庶吉士 6 人</td></tr>
<tr><td>学正、学录（10 人）</td><td>举人（10 人）</td><td></td><td>乾隆 43 年 1 人</td><td>司员 1 人；小京官 7 人
知府 1 人；同知 1 人</td></tr>
</table>

1. 复中进士，拓展仕途。科举时代，出身对仕途的发展尤显重要，进士比举人的仕途要宽广的多。中正榜中的举人虽已入仕为小京官，但出于拓展仕途的考虑，此后仍不断参加科考，以求复中进士。中正榜共选有举人 115 人，后复中进士 39 人，其中 22 人馆选为庶吉士，出了两位状元，一位榜眼和两位探花。中正榜人员楷法端正，而清代殿试恰重书法，“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①] 尤其“乾隆朝已重字不重文”。[②] 另外，任职于内阁和国子监亦是中正榜人员殿试成绩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自乾、嘉以来，得鼎甲者，其以出身内阁中书及各部小京官居多……应是选者，大都工于书法，而殿试读卷诸大臣，或为旧时座师，或为本署长官，或为同乡老辈，赏识有素，故此中遇合，亦非偶然”。[③]

复中进士确实可以拓展仕途。如辛巳中正榜的梁景阳，先以国子监学正用，他于乾隆三十四年中式三甲进士，三十六年升补吏部文选司主事。[④] 吏部为六部之首，文选司又主管文官铨选，向来重视司员出身，“吏部四司，司员将进士出身之人铨选升补”，[⑤] 梁景阳因为复中进士升补吏部文选司主事，此后仕途较顺，官至三品京堂（太仆寺卿）。若复中进士再馆选庶吉士，散馆为翰林，则仕途更佳，如己丑中正榜的徐立纲，乾隆三十七年以学正用，四十年中式

① 王士禛：《分甘余话》卷 2，中华书局，1989 年，第 29 页。
②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　二笔　三笔》，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41 页。
③ 朱彭寿：《旧典备征　安乐康平室随笔》，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77–178 页。
④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20 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67 页。
⑤ 乾隆《钦定吏部则例》卷 5《铨选汉官 · 拣选》，第 222 页。

二甲进士，馆选为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四十四年为湖南乡试主考官，四十五年放安徽学政，[①] 由国子监学正一跃成为学政，士林华选的翰林出身是关键的因素。

2. 初任官职与迁转。仕途与入仕所任官职亦有关系。清代文官升转依据《品级考》，每一官职有其各自的升转线路，入仕官职关系此后的仕进速度和上升通道。内阁中书和国子监学正、学录均为小京官，但前者的升转线路要优于后者。虽然内阁在军机处设立后地位下降，但内阁是法定正一品衙门，品列文班之首。内阁中书撰拟、缮写朝廷重要文书，是内阁重要办事文官，又以科甲入职，是以清代内阁中书“犹称内翰”[②]，与翰林相埒，是士子入仕之佳职。王友亮己丑科会试落第，被选入中正榜以中书用，友人反而致信祝贺“维舍人昔在中书，与学士对称两制，洎乎前明伊始，降同七品之班。第因所处之清严，争谓此途为华美。天依尺五，地接台三。头衔埒于新翰林，体统超乎散进士。何期下第，反得升阶”。[③]

乾隆朝《品级考》定：内阁汉中书内升内阁典籍（正七品）、内阁侍读、六部主事、都察院都事，还可拣选宗人府主事、起居注主事（以上为正六品），内阁中书六年俸满记名外用为府同知（正五品）。[④] 清人有诗曰：“莫笑区区职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随翰苑称前辈，好认中堂作老师。四库书成邀议叙，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⑤] 这首诗形象地说明内阁中书为何升转优且速。内阁中书接近内阁大学士，所得保荐、优叙的机会很多。清代内阁兼管实录馆、《明史》馆、会典馆等，内阁中书常参与修史、编书，军机处的方略馆纂修方略时，其校对官由军机大臣咨取内阁中书兼充。清制，修书均有议叙，如壬辰榜的王庆长以内阁中书充补四库馆分校，《四库全书》告成后议叙一等升补为工部主事，[⑥] 一次升三级。内阁中书六年俸满即可记名外用府同知，府同知虽不是正印官，却是正五品，比内阁中书高五级，如辛巳榜的王宸，内阁中书俸满外用为湖北宜昌府同知。[⑦]

内阁中书还可充补军机章京。军机处为清廷枢要，军机章京办理军机处记注档册、撰拟文稿等日常工作，俗称“小军机”，分满、汉两班，“汉章京及汉军章京以内阁中书、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七品小京官，由进士、举人、拔贡出身者兼充”，[⑧] 而“查军机章京向例由内阁中书挑取者居多，其由六部司员挑取者不及十之一二”。[⑨] 军机章京是军机大臣的重要助手，奖叙颇优，“每遇三年，准军机大臣于满、汉章京内酌保数人，请旨给予议叙。如遇有军务荡平及纂办方略等项告成，随时由军机大臣请旨，酌于奖叙”。[⑩]

表 3　中正榜出身（充补军机章京）的京、外大员

姓名	充补军机章京	仕途	姓名	充补军机章京	仕途
章煦	乾隆 45 年	官至文渊阁大学士	汪日章	乾隆 38 年	官至江苏巡抚
金光悌	乾隆 35 年	官至刑部尚书	吴俊	乾隆 42 年	官至山东布政使
阮葵生	乾隆 29 年	官至刑部右侍郎	姚梁	乾隆 37 年	官至广西按察使
吴熊光	乾隆 40 年	官至两广总督	王庆长	乾隆 37 年	官至福建按察使
孙永清	乾隆 36 年	官至广西巡抚	章棠	乾隆 30 年	官至山东盐运使

---

① 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 4 册，中华书局，1980 年，第 2934、2676 页。

② 福格：《听雨丛谈》卷 3，中华书局，1984 年，第 54 页。

③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 8，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82 页。

④ 乾隆《钦定吏部则例》卷 3《铨选汉官品级考》，第 65 页。

⑤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82 页。

⑥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21 册，第 419 页。

⑦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20 册，第 279 页。

⑧ 光绪《大清会典》卷 3《办理军机处 · 军机章京》，《续修四库全书》第 79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7 页。

⑨ 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32 页。

⑩ 光绪《大清会典》卷 3《办理军机处 · 军机章京》，第 47 页。

充补军机章京对仕途大有帮助。中正榜人员中，京官官至卿贰以上的仅有 5 人，外官三品以上的只有 8 人，早年曾经充补军机章京的就分别占 3 位和 7 位（见表 3）。

国子监学正、学录的迁转线路明显不如内阁中书。国子监只是正四品闲衙冷曹，署内的小京官历来升迁滞慢。乾隆朝《品级考》载，国子监学正、学录俸满应升銮仪卫经历、部寺司务、太常寺典薄、国子监助教等七品小京官。① 大多数以国子监学正、学录用的中正榜人员迁转无期。如辛巳中正榜的叶文馥，乾隆三十一年任国子监学正，四十六年改学录，15 年一阶未升。② 壬辰榜的陈木，乾隆四十一年任国子监学正，此后再未迁转。③ 再如己丑榜的卜维吉，三十六年任国子监学正，四十年升国子监助教，直到五十三年才外用为湖北施南府通判。④ 中正榜内以学正、学录用者，只有复中进士及馆选成为翰林后的仕途要稍好些，如辛巳中正榜李调元，二十七年以学录用，翌年，李复中进士且馆选为庶吉士，后官至直隶通永道。⑤ 再如己丑榜的朱攸，乾隆三十六年为国子监学录，三十七年中二甲进士并馆选为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再外转为江西吉安知府。⑥ 这又说明文官仕途和出身及入仕官职有莫大关联。

当然，仕途并非完全取决于出身和入仕官职的优劣。比如己丑榜的甄松年，以内阁中书用，乾隆五十三年才升补内阁典籍，五十四年中式进士，但五十六年才升补刑部主事，⑦ 而此时他已 51 岁，仕途止于此。辛巳榜的余瑚，乾隆二十七年任国子监学录，三十四年升国子监助教，三十七年中式进士，结果归班铨选，复任国子监学录。⑧ 己丑榜的潘有为，“性落落，不事权贵，官中书十余年不迁，丁外艰归，不复出”。⑨ 中正榜共出了五位鼎甲，但他们的仕途都很一般。乾隆三十六年状元黄轩，官至川东道。四十年状元吴锡龄，官至翰林院修撰，榜眼汪镛，官至顺天府丞，探花沈清藻，官至翰林院编修。四十三年探花孙希旦，官至翰林院编修。⑩ 内阁中书充补军机章京也不是都能擢至显职（按：中正榜共有 31 人充补军机章京），如己丑榜的龚禔身，乾隆三十八年以中书充军机章京，但此后并未升一级。还有壬辰榜的毛上炱，以进士选中正榜，乾隆四十五年充补军机章京，但也仅官至户部主事。⑪

自身能力及个人际遇在仕途发展中同样很关键。如辛巳榜阮葵生，以举人为内阁中书，再充补军机章京，他久任刑曹，熟知律例，“治刑以明察平允见称于时，能识大体不为苛细”，⑫ 为时任大学士管刑部的刘统勋所赏识，因多次总办秋审得当，被乾隆帝识拔，四十七年特旨以刑部郎中擢为通政使司参议，五十年超擢为刑部右侍郎。己丑榜的孙永清，乾隆三十六年以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撰拟精当，事至辄倚以办，迁侍读”，⑬ 五十年，孙永清擢升广西巡抚，乾隆帝“谕奖永清自驻南宁，弹压边关，筹办饷糈，措置得宜，赐孔雀翎”。⑭ 再如壬辰榜的吴熊光，充军机章京，“纯庙（乾隆帝）幸滦阳时，苗匪未靖，而教匪渐猖獗，训政尤勤，或午夜视

---

① 乾隆《钦定吏部则例》卷 3《铨选汉官品级考》，第 67-68 页。

② 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 46《官师志五・官师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752 页。

③ 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 46《官师志五・官师表》，第 753 页。

④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22 册，第 282 页。

⑤ 朱汝珍编著：《词林辑略》，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 18》，明文书局，1985 年，第 197 页。

⑥ 朱汝珍编著：《词林辑略》，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 18》，第 210 页。

⑦ 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 22 册，第 355、625 页。

⑧ 文庆、李宗昉等纂修：《钦定国子监志》卷 46《官师志五・官师表》，第 752 页。

⑨ 张维屏辑：《国朝诗人征略初编》（二）卷 40《潘有为》，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 29》，第 413 页。

⑩ 朱汝珍编著：《词林辑略》，第 205 页、211 页、212 页、216 页。（汪镛以顺天府丞原品休致，见《清仁宗实录》卷 266，嘉庆十八年二月乙卯。《词林辑略》载其“官至左副都御史”有误。）

⑪ 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第 206 页、209 页。

⑫ 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 96《阮葵生》，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 7》，第 314 页。

⑬《清史稿》卷 332《孙永清传》，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0972 页。

⑭《清史稿》卷 332《孙永清传》，第 10973 页。

事。一日宣军机大臣不得，命召军机章京，惟公已上值入对称旨。上曰，军机事日繁，傅森、吴熊光皆任事，可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助”,[①] 吴熊光此后历任封疆，嘉庆十年（1805）任两广总督，于剿捕教匪、绥靖地方等事务颇为得力，因此受到嘉庆帝重用。阮、孙、吴三人，以举人入仕，自身能力出众，同时抓住为君主赏识的际遇，而得以濬升卿贰、身膺疆寄。

三、余论

（一）中正榜与明通榜辨析

清代的中正榜和明通榜都是于会试正榜外另设之榜，两者在选取目的、标准及人数等方面有明显区别。但地方志和文人笔记对它们的介绍常模糊不清，[②] 今人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论著也常将中正榜当作明通榜，[③] 是以有必要对两者进行辨析。

明通榜是雍正、乾隆年间于会试落卷内拣选人员以教职用而另出之榜。“雍正五年三月议准，会试落卷内拣选文理明通者引见以教职即用。嗣于乾隆二年、十年、十九年俱照此举行录用如之，谓之明通榜”,[④] 乾隆二年定“拣选下第举人文理明通者，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引见钦定，令回本省以学正、教谕即用”，[⑤] 明通榜名即来自“文理明通”。

中正榜和明通榜的区别在于：首先，选用官职不同。中正榜是为选取内阁汉中书和国子监学正、学录而设，明通榜则是选取各省教职人员。其次，中正榜选取标准是“文理尚通、诗律稳妥、字画端楷”等，文与字并重，而明通榜则是“文理明通”，前者要求相对较高。第三，中正榜每次不过选取四十人上下，只开三次，共取 131 人，而明通榜则按省选取，人数较多，仅乾隆七年就录取了 690 名。[⑥] 另外，明通榜选取的均为会试下第举人，而中正榜内包含部分是科进士。

中正榜为何总是被明通榜张冠李戴？笔者认为，一是明通榜开设略早于中正榜，且其选取的次数和所取人员又较多的缘故。明通榜从雍正五年起设，乾隆朝又多次选取。而且，乾隆二十六年中正榜设立后，“如逢应取明通榜之年，更于中书外照例选取”，[⑦] 也就是说，明通榜并未因为中正榜的开设而停止选取，如刘秉恬，“乾隆二十一年举人，二十六年取中明通榜”。[⑧] 中正榜正是乾隆二十六年开设，这年同时选取了明通榜。另如“张九钺，字度西，号紫岘，湘潭人。乾隆壬午举人，癸未（乾隆二十八年）明通榜，官海阳知县。有《陶园集》”，[⑨] 乾隆二十八年未选中正榜，但选取了明通榜。二是明通榜举人也可考补内阁中书。在中正榜设立前，有不

---

① 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 190《吴熊光》，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 7》，第 282 页。

② 陆以湉《冷庐杂识》介绍内阁中书来源云：“有以会试荐卷中取为明通榜而得者（乾隆间有之，今不复举行），婺源王葑亭通政友亮，于乾隆己丑会试列明通榜，授此官”（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82 页），此处的明通榜应是中正榜，王友亮入选己丑中正榜。李放辑《皇清书史》有“沈恩湛，字培元，别号静天居士，钱塘人，乾隆三十七年以举人中明通榜，官内阁中书，以书名于时”（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艺林类 23》，第 333 页），沈恩湛入选壬辰中正榜。郭柏苍《竹间十日话》载福建人物，“‘华林坊’三字，乾隆壬午举人、明通榜进士蔡镇笔”（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委员会整理，2001 年，第 82 页），蔡镇入选己丑中正榜。

③ 屈海龙《雍乾时期明通榜小议》(《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 年 8 期）将清代政书中的中正榜相关内容放在明通榜下。陈佳《清代朝廷书法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3 年）第五章第一节“清代中书群体”，将中正榜选取内阁中书变成明通榜选取内阁中书。

④《清朝通典》卷 18《选举一》，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2132 页。

⑤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353《礼部・贡举》，第 538 页。

⑥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 9，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19 页。

⑦《清朝文献通考》卷 51《选举五》，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5333 页。

⑧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 27《刘秉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2044 页。

⑨ 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 91《张九钺》，退耕堂刊本。

少明通榜举人考补内阁中书，如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乾隆十九年中明通榜，用内阁中书”，[①] 上面提到的刘秉恬也于“乾隆二十四年七月以内阁中书入值（军机处）”。[②] 而中正榜就是以选取内阁中书为主，如此一来，很容易将两榜混为一谈。

中正榜和明通榜的性质类似，选取的时间间隔不远，甚至同时选取，而两者又在任职上出现一定的重合，因此易造成混淆。又因明通榜选取次数和人数明显多于中正榜，在士子中的影响面更广些，所以清代不少笔记和地方志出现记载笔误，若未核对清代官方政书而引用这些笔记史料，则会出现错误。

（二）中正榜人员的文化成就

中正榜人员均为科甲出身，文化水平颇高，于经史、诗文、书画等方面多有成就。己丑榜孙希旦，复中乾隆四十三年探花，学问渊博，“其于诸经尤深于三礼，有未当辄以己意为之训释，谓之注疏驳误。乃益取宋元以来诸家之书，推广其说，为集解六十一卷”，[③] 孙希旦的《礼记集解》是《礼记》注疏的代表作之一。同榜的任基振“笃志研经，著《尔雅注疏笺补》，戴震序称其考索精详。震著《尔雅文字考》，多引其说”。[④]

辛巳榜的李调元，是清代中期著名文学家，蜀中才子，“自经史百家以及稗官野乘，靡不博览。所为诗文，天才横逸。朝鲜使臣见其诗，以为超脱沿袭之陋，而合于山谷、放翁，极为敬服，因作启求其他著述而去”。[⑤] 董潮，“工诗文，兼善六法。尝赋红豆树歌，传诵都下，称为红豆诗人”。[⑥] 阮葵生精通律例，同时诗文亦佳，“其诗秀逸沉雄，各体皆足以当时流”。[⑦] 王宸是清代著名书画家，其画“枯毫重墨，气味荒古”，[⑧] 书法“似颜鲁公，所藏碑刻，多世所未见者”。[⑨] 己丑榜的张埙是其时较有名望的诗人、书法家和金石鉴赏家，其“考证金石及书画题跋颇为详赡可喜。诗秀瘦可爱，书法亦然”。[⑩] 潘奕㑺“喜吟咏，书宗颜柳，篆隶入晋汉人之室。工画，梅兰水仙，信手挥洒，颇有生趣”。[⑪] 潘奕㑺宦情淡薄，早年辞官，悠游林下，卒年 91 岁，重逢鹿鸣和琼林，是中正榜人员中最长寿者。邱庭澍亦以画闻名，“工画山水，落笔纵横，顷刻立就”。[⑫] 龚禔身的诗“格高词清，既关艺文，又负才思”。[⑬] 壬辰榜的毛上炱为清代名画家，“供奉内廷，山水初学麓台，与王蓬心（王宸）齐名。后临摹宋元，纵横变化，独自成家”。[⑭] 另如范来宗，“工写花卉，别具秀骨，行楷亦复工妙”。[⑮] 中正榜人员在文学、书画等领域的诸多成就展示了清代科举精英在政治生活之外的文人本色。

（三）中正榜的终结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礼部奏请照例于会试后选取中正榜，但乾隆帝决定停止此例：

> 向例录取中书，系于会试揭晓后，将未经中式墨卷送入内帘，交主考阅取。朕思移送落卷

---

①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 72《赵翼》，第 5911 页。

② 梁章钜、朱智：《枢垣记略》，第 202 页。

③ 徐世昌纂：《清儒学案小传》卷 11《孙希旦》，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 · 学林类 5》，第 488 页。

④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 68《任大椿传附任基振》，第 5511 页。

⑤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 72《李调元》，第 5917 页。

⑥ 张维屏辑：《国朝诗人征略初编》（二）卷 40《董潮》，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 · 学林类 29》，第 391 页。

⑦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年，第 1215 页。

⑧《清史稿》卷 504《王时敏传附王宸》，第 13901 页。

⑨ 震钧辑：《国朝书人辑略》卷 6《王宸》，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 · 艺林类 24》，第 419 页。

⑩ 震钧辑：《国朝书人辑略》卷 6《王宸》，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 · 艺林类 24》，第 432 页。

⑪ 窦镇辑：《国朝书画家笔录》卷 2《潘奕㑺》，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 · 艺林类 22》，第 198 页。

⑫ 冯金伯：《墨香居画室》卷 5《邱庭澍》，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 · 艺林类 7》，第 210 页。

⑬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第 1386 页。

⑭ 李濬之编辑：《清代画家诗史》丁下 45《毛上炱》，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 · 艺林类 12》，第 304−305 页。

⑮ 冯金伯：《墨香居画室》卷 7《范来宗》，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 · 艺林类 7》，第 303 页。

时，拆阅弥封，查对红号，恐有漏泄情弊。而考官阅看墨卷，笔迹亦易于认识。且其时会闱已经撤棘，复行甄录中书，尤非慎重关防之道，向来定例本未周密。况中式进士引见归班者，十年方能铨选知县，而落第者录取中书，转可即日得官。补缺后，六年俸满，又可内用主事，外用同知，比县令阶级转大，实未平允。着将落卷内录取中书、及学正学录之例，即行停止。俟带领覆试合式之新进士引见后，除已经录用之庶吉士、部属，即用知县外，其余归班进士，再交吏部按照甲第名次，通行带领引见，俟朕记名二三十人，以中书录用，不记名者，仍行归班。如此则考官无从滋弊，而归班进士，添一录用之途，实属两有裨益。所有本年会试落卷，如未经挑取，竟可毋庸办理，即已经录取，亦可不必。嗣后如挑取学正、学录，亦照此办理。①

乾隆帝以慎重关防和中正榜举人升转较速等为由，停止选取中正榜，看似周全，其实不然。对于选取中有可能出现的所谓拆卷弥封，认识墨卷笔迹等情由，乾隆帝担心的并不是条例是否严密，而是主考官在选取中以私恩交结士子，名器邀于上，岂能出自臣？乾隆帝多次出巡，每到一处召试士子，或授予官衔，或给予功名，其召试一等者例授内阁中书，仅六下江南，就授予江、浙、皖、闽等地士子 82 人为内阁中书，② 几乎相当于两次中正榜的选取人数。至于举人选取内阁中书对进士不公允的理由也很牵强，其召试一等授内阁中书者，几乎都是举人，且大多数还是特赐举人功名。清中后期捐纳大开，内阁中书援例亦可得，这对进士更不公允。

实际上，自乾隆三十七年以后就未选取过中正榜，此例虽在，但形同虚设。清代学者张惠言“乾隆五十一年本省乡试中式，明年赴礼部会试，中中正榜，例充内阁中书，以特奏通榜，皆报罢”。③ 这说明会试后仍在按例选人，但最后是否成榜，还要取决于上意。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会试后，“此次会试挑取学正、学录，恭遇圣驾南巡，所有试卷，免其进呈”，④ 此科会试后选取了国子监学正、学录，但未挑取内阁汉中书，不能称为中正榜。此后，因新进士选用人数有限，加上正常的官员迁转，内阁汉中书和国子监学正、学录常会出现选补无人的情况，无奈之下，嘉庆和道光朝又恢复考试选补制。嘉庆十年“奏准，国子监学正、学录缺出，现在乏员充补，仍照向例，传令进士、举人考试引见记名，按其名次挨补”。⑤ 道光二十年（1840）“吏部奏请考试中书，内阁汉中书在部候补者止有一人，请仿照国子监学正、学录之例，于进士、举人内考试录用”。⑥

中正榜开设的目的十分明确，它根据所要选补官职的职司所需在参加会试的士子中挑选合适人选。中正榜将选才与选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结合，因职选人，是对科举人才精细化地疏通和分流的一次有益尝试。但是，中正榜从开设到停止的整个过程无不显示出君主专制政体中文官铨选的随意和因循，选人与选官之法的变革并不是要体现制度的最佳性，而是突出君主对用人之权的乾纲独断。

① 《乾隆朝上谕档》第 15 册，第 584 页。

② 据《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 年）所载人数统计。

③ 恽敬：《张编修惠言墓志铭》，钱仪吉编：《碑传集》卷 5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93 辑，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2549 页。

④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353《礼部 · 贡举》，第 540 页。

⑤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58《吏部 · 汉员遴选》，第 52−53 页。

⑥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57《吏部 · 汉员遴选》，第 49 页。